

智庫顧問吳易風教授訪談錄

■ 云南大學經濟學院 張林

了數學方法。不僅如此，馬克思還對數學進行了專門研究，對當時剛剛出現的微積分進行了專門研究，著有《數學筆記》。

有些學者認為，數學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工具，運用數學無法解決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還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經濟學排斥數學方法。實際上，這些觀點都是誤解。

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代，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方法還不普遍，使用高等數學方法更是鳳毛麟角，馬克思走在了時代的前列。在21世紀的今天，數學自身有了巨大的發展，數學的應用也非常廣泛。因此，我們應該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中的數學建設。首先，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模型，把馬克思經濟學中量的關係用數學模型表述出來，在此模型基礎上說明現實經濟現象，提出相應的對策。其次，目前，西方經濟學中普遍使用數學方法，有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排斥數學方法的，是不能用數學的方法表述的；還有些西方經濟學家使用數學方法來責難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建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數學模型，有利於回答西方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挑戰，有利於有力地反駁西方經濟學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責難。

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中的數學建設可以分階段、分步驟地進行。第一步，組織隊伍。第二步，選擇研究專題。第三步，準確掌握馬克思的原意。在完成這個階段的工作之後，我們才能真正進入運用數學方法的階段。第四步，充分了解國內外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數學建設方面的已有成果。第五步，根據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建立表述馬克思原意的數學模型。第六步，經過至少十幾年時間，通過幾批人的努力，爭取建立一個系統、全面、準確的馬克思經濟學的數學體系。這項工作是一項長期的、系統的工作，要完成它，必須按照既有步驟，扎扎实實地一步一步地進行。

不過，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中的數學建設，並非數學方法運用得越多越好、越複雜越好。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方法需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要真正弄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真實的內容是什麼，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真正表述馬克思原意的數學模型；第二，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方法，要堅持“解決同樣問題，方法越簡單越好”的原則；第三，對不同的經濟問題要使用不同的數學方法，切忌在經濟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機械地使用同一方法；第四，不要將數學方法作為一種包裝。如果僅僅將在經濟學中使用數學方法看作一種潮流，看作評價經濟學水平高低的唯一標誌，在研究過程中，為了用數學而用數學，反而忘記了對經濟問題自身的研究，那麼這時數學就不再是經濟學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而是變成了包裝，這將不利于經濟學的發展。

在現實的經濟思維中，大款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常常分別成為不同經濟學家的出發點。儘管人們很不願意聽到大款經濟學家和人民經濟學家的稱謂，但是誰也否認不了實際存在的這種區別，除非大家都團結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

張林：《馬克思經濟學數學模型研究》一書，獲全國第四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獎，據說有國外出版社購買了版權？

吳易風：據悉，加拿大一家出版社向這本書的版權所有方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購買了英文版版權。

張林：您作為一位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在“兩種‘范式危機’論”（載《當代經濟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我記得當時相信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子們紛紛傳閱此文，备受鼓舞。由此引出一個話題：經濟學家為什麼不能“團結在一個旗幟下”？您主張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做“人民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是否必定就是人民經濟學家？

吳易風：有的學者想追求一種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的經濟學基礎理論，一種無階級性的經濟學基礎理論。這一想法的動機也許不坏。如果真的有這樣一種經濟學，對初學者和研究者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國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就可不必學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後還要再研讀西方經濟學。對研究者來說，大家也許就真的能“團結在一個旗幟下”，為無疆界的共同科學事業做出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就不會只發給西方經濟學家，而沒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份兒，更不會把喬安·羅賓遜這樣的左派凱恩斯主義者拒之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門之外。可是，歷史无情，現實無情。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過去和現在都不存在這樣一種經濟學。

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而且也沒法“團結在一個旗幟下”，是因為經濟學具有階級性。經濟學的階級性使這個領域的自由的科學研究成為不可能。正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說的那樣：“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西方學者也不全都詆言自己的階級立場，比如凱恩斯在《勸說集》中曾直言：“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麼我就得追求屬於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鬥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本階級一邊的”。經濟學這門學科的階級性決定了在階級社會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統一的經濟學。

在現實的經濟思維中，大款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常常分別成為不同經濟學家的出發點。儘管人們很不願意聽到大款經濟學家和人民經濟學家的稱謂，但是誰也否認不了實際存在的這種區別，除非大家都團結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

張林：您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

論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且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研究，系統梳理和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鄧小平、陳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巨大貢獻。在研究他們的貢獻時，您指出：“未來的探索者也會理解今天的探索者，處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成熟階段的經濟學家，確實難以寫出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今天的探索者會希望於未來的探索者，希望他們今后能寫出越來越接近科學真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毛澤東《論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評論》2004年第1期，第26頁）。您這句話，可以看作對今天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的寄語吧？

吳易風：在新中國不同的發展階段，毛澤東、陳云和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進行了歷史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理論。比如，毛澤東、陳云和鄧小平對計劃和市場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和創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理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陳云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理論，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理論——都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科學社會主義史上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他們的理論，不僅在過去指導着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而且今天仍然具有理論的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我們今天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了更廣闊的歷史背景、更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然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完善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只有逐步積累在每個具體歷史階段上獲得的並經過實踐驗證的認識，不斷推進，不斷深化，才能逐漸接近於科學真理。毛澤東說得對：“絕對真理包括在相對真理裏面。相對真理的積累，就能使人們逐步地接近於絕對真理。不能認為……到了一天，人們忽然找到了絕對真理。”

張林：西方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也是您的研究領域。有一種說法，認為馬克思也是西方人，為什麼馬克思經濟學就不是“西方經濟學”？過去中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這個用語的含義非常清楚，但現在很多年輕學者都不大明白了。很多人用“現代經濟學”之類的稱呼替代“西方經濟學”。請您解釋一下“西方經濟學”這個用語。

吳易風：作為經濟學研究領域一門獨立學科和高等學校一門獨立課程的“西方經濟學”這一稱號在我國出現較晚。新中國成立以來，這一學科和課程的名稱經歷了幾次改變。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內有幾所大學嘗試開設相關課程，內容一般限於凱恩斯主義，因而課程名稱定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介紹與批

判”或“凱恩斯主義介紹與批判”。以中國人民大學為例，當時吳大琨教授、項沖教授為經濟系本科生開設的是“凱恩斯主義介紹與批判”課程，高鴻業教授先為經濟系教師，後為研究生班開設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學介紹與批判”課程。兩門課程的範圍不同：前者限於凱恩斯主義，後者包括西方經濟學的幾個主要組成部分。吳大琨、項沖和高鴻業教授都是從海外歸國的學者，他們熟悉西方經濟學，回国後又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教學中，他們不僅力求準確地介紹西方經濟學，而且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評論西方經濟學。

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設同類課程的高校增多，教學內容除了凱恩斯主義，還增加了壟斷經濟學等。這時課程名稱一般定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介紹與批判”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說”。改革開放初期，一些高校將課程名稱改為“外國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這一稱號形成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內涵與“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說”相同。這一稱號很快得到我國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科名稱，並且成為教育部和國家學位委員會規定的這一學科的正式名稱，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的正式名稱。

西方經濟學中的“西”不是中西意義上的西，也不是“中學與西學”意義上的西。這裡的西方不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政治上的概念。比如“西方七國集團”就是政治概念，不屬於西方地緣的日本就包括進去了嘛。可見，用“西方”二字作為一種特定的、流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的定語，是為了正確反映這種經濟學的本質屬性，以區別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現在有人主張將西方經濟學為“現代經濟學”或“當代經濟學”，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歸入“古典經濟學”。熟悉西方經濟學的人知道，這種說法來自西方經濟學家。如果接受西方學者的謬說，就勢必會錯誤地將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當作現代或當代唯一的經濟學，同時，就勢必會錯誤地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排除在現代或當代經濟學之外。事實上，除了主流經濟學之外，在西方還存在大量的非主流經濟學流派和理論。西方經濟學遠非現代經濟學的全部。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絕不是古典經濟學，而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革命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嶄新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馬克思以後一直在發展，因此，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歸入“古典經濟學”。在現代，仍然存在着兩大對立的理論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是西方經濟學。因此，決不能認為現代經濟學就是西方經濟學，決不能用現代或當代經濟學專指西方經濟學。 (完)

塞勒的架橋經濟行為和心理活動

■ 杜卿卿



非理性的普通人，探討機會成本與稟賦效應，建立非理性行為清單，論證前景理論與價值函數等等。這些研究也為塞勒後期的理論形成奠定了基礎。

事實上，此次諾獎花落行為經濟學，主要是為了表彰塞勒在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自我控制不足等領域的經濟分析。諾獎評審委員會認為，塞勒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範圍，在人们的經濟行為和心理活動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對經濟研究和決策意義重大。

在有限理性方面，塞勒開創了“心理賬戶”理論，即一個人會針對單個的心理賬戶來決策，而不是針對整體的影響而決策；社會偏好方面，塞勒通過實驗發現，相對於需求推動的價格上漲，消費者更願意接受成本推動的價格

上漲，認為後者更公平；自我控制不足方面，塞勒發現，人們往往會因為短期誘惑而放棄長遠利益，並非所有人都像理性經濟人一樣，為養老儲蓄適當額度的資金，因此幫助人們存錢是必要的，比如制定養老金計劃。

利用投資者的失誤來賺錢

與很多諾獎得主不同，塞勒對有限理性、社會偏好、自我控制不足的研究，也成為他進行投資實踐的理論支撐。

1993年，塞勒與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富勒合伙成立了富勒&塞勒資產管理公司（Fuller & Thaler Asset Management），目前管理資金超過90億美金。而該機構的投資理念就是“投資者會失誤”、“利用投資者的失誤來賺錢”。

金融市場是傳統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衝突”最激烈的地方。金融市場的特點是交易頻繁而迅速，價格快速發現並形成。換言之，如果有人犯了錯，還有一部分聰明人會起到平衡作用，“校正”價格，所以愚蠢的行為不會影響市場價格。

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常說的“有效市場假說”，即市場是有效的。一般而言，這一假說包含兩部分，一是“價格是合理的”，二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也稱之為“沒有办法跑贏市場”。這個理論最初由傳奇人物尤金·法瑪提出，後來一直被當作經濟學的基本假說。

塞勒對有效市場假說的態度十分明確。首先，可認其規範標準的參照性。如果沒有理性模型作為起點，行為金融學的研究就無從開始；如果沒有理性框架，也就沒有所謂反常現象，也就無法發現非理性行為。無論研究什麼課題都需要一個起點，有效市場假說就是這個最佳起點。

其次，不認可“有效市場假說”對資本市場的描述。從股市來看，大多數基金管理者都沒有

跑贏市場，但是市場確實有反常現象，也有非理性行為，有時反應過度，有時反應不足。

事實上這也恰恰是塞勒後來成立資管公司的主要理論基礎——投資者往往對壞消息反應過度，對好消息反應不足，這就是賺錢的機會。“賺錢是有可能的，雖然不容易。”

塞勒對金融市場非理性行為的研究，是理論與實踐並行的。富勒&塞勒資管公司官網的首頁已經掛出了塞勒獲得諾獎的消息，同時還有對行為金融學的定義——心理學與金融學的交叉領域，為人们的非理性投資行為提供解釋。同時以顯眼字體打出了公司的投資理念——投資者會犯錯，我們尋找這些錯誤。有兩種錯誤會創造買入機會，過度反應和不足反應。

對於有效市場假說的第一部分，塞勒也不認可，不但不認可“價格是合理的”，還認為價格通常都是錯誤的，有時候甚至錯得很離譙。以房地產為例，當房價快速上漲時，如果房主和銀行都是理性經濟人，應該會意識到價格下跌的可能性在增大。但是調查顯示，人們沒有預期價格會回歸，反而認為房價會漲得更高。

對於未來行為經濟學發展的展望，塞勒在《錯誤的行為》一書中列出一份自己的心願清單，他希望經濟學所有分支都可以從研究普通人的行為中獲得益處，尤其是宏觀經濟學。不過，在他看來，經濟學研究創新是有風險的，但是依然要堅持。

在行為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很多次向經濟學領域的重要人物提出，理性模型是不符合事實的。但是，我不能建議所有人都從事我這樣的高風險職業，我是一個特例，我很幸運在最恰當的時間點碰到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不過，當你的機會成本很低時，承擔風險並且直言不讳是值得的，當你所尋找的道路和我所從事的事業一樣有趣時，你更應該如此。

在行為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很多次向經濟學領域的重要人物提出，理性模型是不符合事實的。但是，我不能建議所有人都從事我這樣的高風險職業，我是一個特例，我很幸運在最恰當的時間點碰到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不過，當你的機會成本很低時，承擔風險並且直言不讳是值得的，當你所尋找的道路和我所從事的事業一樣有趣時，你更應該如此。

■ [上接 01 版]

家人到斯坦福大學訪問。塞勒亲眼見證了兩位心理學家“前景理論”論文的完成，並與卡尼曼進行多次“山間散步”。除此之外，塞勒所有時間都待在經濟研究局，“除了思考，什麼都不做。”

早期在羅切斯特大學的研究對塞勒來說並不理想，在他看來，那些資深教授拘泥於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而後來爭取到斯坦福大學做研究的那一年，才讓他在某個時刻突然決定，要全身心投入研究人類的“行為”這項新事業。

塞勒受到諾獎表彰的主要研究也在這一年當中得到確認。在此期間，塞勒完成了兩篇論文，並確定了“心理賬戶”和“自我控制”的兩個首要研究課題。同時，他爭取到了康奈爾大學的教職，康奈爾大學成為塞勒行為經濟學系統研究的重要基地。

在康奈爾大學期間，為了獲得終身教職，塞勒發表了多篇論文。1975至2015年間，除2010年外，塞勒每年都會發表學術論文，有時候一年就發表五篇，十分勤奮。與此同時，塞勒還出版了五本專著，前期主要是《贏者的詛咒》（1991）、《類理性經濟學》（1991）、《行為金融學演進》（1993），2008年出版了令他蜚聲海內外的《助推》，2015年又出版了暢銷至今的《錯誤的行為：行為經濟學故事》。

在最近的這本專著中，塞勒既介紹了行為經濟學的主要論述，也坦誠講述了自己從入門到有所成就的過程，同時介紹了行為經濟學從無到有的發展歷史。該書也全面地展示了塞勒對推動經濟學研究範圍的擴大、推進行為經濟學的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通過不斷的交流研討、專注的研究實驗，以及大量的論述寫作，塞勒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理論也廣為傳播。70年代是行為經濟學的發轫期，塞勒在這段時期內對多个經濟學基本假設進行了系統思考，包括區分理性經濟人與

心理賬戶、社會偏好、自我控制不足。

那個夏天快結束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